

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ZHONG GUO

DANGDAIWENXUESHIGAO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

●
十二院校合编

下
册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12 院校合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

下 册

主 编 高文升 单占生

副主编 刘明馨 王 敏 樊洛平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闻 诗
封面设计 素 晓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

主 编 高文升 单占生
副主编 刘明馨 王 敏
樊洛平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卫生厅青年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9.5印张 487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215-00758-8/H·36

定 价 7.15元 (上、下册)

顾 问 龚依群 鲁枢元 孙 荪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宗周 王今玉 王居瑞 王 敏 朱卫国 刘明睿

庄 众 孟 芳 陈 净 单占生 张喜田 赵金钟

贺 晓 徐永年 高文升 唐惠琳 樊洛平

撰稿人 龚依群 姚小亭 王小林 冯 尚 刘明川 韩宇宏

丁安仪 郭运恒 翟传增 张新义 孙春旻

(编委均参加了撰稿工作)

下册目录

第五章	小说	(1)
第一节	当代小说概观	(1)
第二节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小说创作	(16)
第三节	孙犁的文学创作与刘绍棠的乡土小说	(22)
第四节	峻青、王愿坚、茹志鹃的 战争生活小说	(28)
第五节	杜鹏程等人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	(34)
第六节	梁斌及其《红旗谱》	(40)
第七节	杨沫及其《青春之歌》	(45)
第八节	柳青及其《创业史》	(49)
第九节	周立波及其《山乡巨变》	(57)
第十节	五十年代中期的探索小说	(61)
第十一节	“文革”十年小说与浩然现象	(66)
第十二节	王蒙的小说创作	(71)
第十三节	刘心武、李国文的小说创作	(77)
第十四节	高晓声、张一弓等人的 农村生活小说	(82)
第十五节	蒋子龙等人的社会变革小说	(89)
第十六节	陆文夫、邓友梅的市井小说	(95)
第十七节	从维熙和张贤亮的“大墙文学”	(100)
第十八节	张洁、王安忆等女作家的小说	(106)
第十九节	徐怀中、李存葆、朱苏进的军事小说	(114)
第二十节	新时期的知青小说	(120)

第二十一节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 《古船》……………	(128)
第二十二节	李準及其《黄河东流去》……………	(136)
第二十三节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141)
第二十四节	汪曾祺、林斤澜小说的艺术追求…	(146)
第二十五节	张承志的小说世界……………	(153)
第二十六节	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的文化寻根 小说……………	(159)
第二十七节	刘索拉、莫言、残雪等人的新潮小 说……………	(167)
第二十八节	微型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171)
第六章	通俗文学 ……………	(181)
第 一 节	当代通俗文学概述……………	(181)
第 二 节	冯骥才的传统文化小说……………	(189)
第 三 节	侦破传奇小说……………	(196)
第 四 节	新编武侠小说……………	(202)
第 五 节	伦理言情小说……………	(209)
第 六 节	秘闻轶事小说……………	(214)
第七章	台港澳文学 ……………	(219)
第 一 节	台港澳文学概况……………	(219)
第 二 节	聂华苓等台港女作家的小说……………	(233)
第 三 节	白先勇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	(240)
第 四 节	陈映真及台湾乡土小说……………	(248)
第 五 节	金庸、琼瑶等人的武侠、言情小说…	(256)
第 六 节	徐达然、三毛、柏杨的散文创作…	(262)
第 七 节	余光中、杨牧等人的现代诗……………	(268)
附 录	新时期文学作品获奖篇目 ……………	(278)
后 记 ……………		(292)

第五章 小 说

第一节 当代小说概观

中国当代小说在风雨坎坷中走过了40年光荣而艰难的历程。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部门，当代小说以其热诚的文学使命和独具的艺术品格，真实地描摹了我们这个新生国度的历史命运、现实风貌和民族的灵魂情感、生存景观，并不断通过新的艺术变动信息和创作实体，来致力于小说自身的探索和革命。当代小说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广度方面不可替代的意义，它对改造、重塑民族灵魂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艺术更新、文学思潮走向所发生的深刻影响，使这种具有独特魅力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样式，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实绩。

当代小说从整体发展来看，经历了建国后17年、“文革”时期、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而长、中、短、微型这四种不同的小说体裁，又各以其自身的艺术规律，表现出创作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试图透过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来追踪当代小说的演变轨迹。

一、建国十七年的小说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当代小说呈现出既生气勃勃、又纷繁复杂的创作面貌。置身于20世纪文学的格局中，当代小说纵向继承了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发

展，使之成为反映时代风貌的重要途径。在横向借鉴上，由于文学开放意识的匮乏和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当代小说主要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与西方文学则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缺少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撞击，这使当代小说更多地置身于一种自足的、封闭的、单一的文学氛围之中。17年的文艺界，对文艺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特殊强调，使当代小说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大大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这样，真诚的歌颂与热情的浮夸相交织，现实主义的主潮与伪现实主义的逆流相抗衡，文学的独特品格与大一统的社会观念相冲突，这种充满矛盾的两难境遇使17年小说变得色彩斑驳，真伪共存。

短篇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尖兵，始终活跃在现实生活的前线。社会生活的风雨，世态人情的变迁，艺术更新的信息，文艺思潮的起伏兴衰，往往首先在短篇小说中得到反映。建国初期，新生共和国的强烈进取精神和单纯、明朗、真诚的生活信念，鼓舞着广大作家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创作中。这使50年代前半期的作品，多是同步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新时代的明朗色彩和清新感。但由于对新生活的不够熟悉和理解，由于强调创作对中心任务的配合，不少作品停留于演绎具体政策和如实摹写局部生活现象，创作的整体质量并不高。

就题材侧重而言，本时期的农村小说占据很大比重。表现家庭、婚姻题材，成为农村小说最初的热点。这与当时贯彻婚姻法的新生活力量的冲击有关，更与人民朴素的反封建愿望相连。马烽的《结婚》，赵树理的《登记》，康濯的《春种秋收》，谷峪的《新事新办》，高晓声的《解约》，都反映出农民渴望挣脱封建陋习和伦理观念的束缚，主宰婚姻恋爱和人生命运的要求。特别是堪称这类小说代表作的《登记》，更是在新旧两代农民的婚姻遭遇和命运变迁中，写出了农村反封建任务的长期性和艰难性。

从1953年开始，随着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行，描写农村历史变革的生活画面，反映农民向公有制转变的艰难历程，

表现公与私尖锐对立的主题，构成这一时期农村生活短篇小说的主体风貌。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王汶石的《风雪之夜》，艾芜的《夜归》，刘绍棠的《青枝绿叶》，吉学霈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秦兆阳的《农村散记》等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展现出农村的沸腾生活和现实矛盾。

对革命战争题材的关注，是5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对于一个刚刚从战争硝烟中走过来的民族，昨天的艰苦岁月，今天的抗美援朝斗争，不能不深深地打动我们的作家。巴金以《黄文元同志》、谷岩以《枫》，率先唱出动人的抗美援朝之歌。特别是路翎，他连续发表了《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在表现志愿军战士的精神世界和战争中的人性、爱情与责任感方面，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独特视角。

革命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的真正起色，是与50年代这样一些作家的名字和风格相连的。孙犁以充满诗意的《山地回忆》、《吴召儿》，使战争小说别开生面；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则在血与火的交织中显示出雄浑悲壮的风格；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是以含蓄凝炼的艺术表现力，产生了雕塑般鲜明的艺术效果；茹志鹃的《百合花》、肖平的《三月雪》、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则以深沉、细腻、清新的风格，引起人们无限的情思。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给文艺界带来思想解放的空气和艺术创造的活力，随之而来的“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热，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準的《灰色的帆蓬》、刘绍棠的《田野落霞》、何又化的《沉默》、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作品，或勇敢地触及了官僚主义问题和其他现实生活矛盾，或在爱情、人性、伦理道德等敏

感区域深入开掘，显示出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但这种难能可贵的文学探索很快被反右扩大化所中断，短篇创作出现的新气象犹如昙花一现。

1957年到1965年，频繁多变的政治运动不断助长着左倾思潮的泛滥，现实灵敏度很强的短篇小说比其他文学样式更直接更切身地感受到社会风雨的冲击，整个创作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这在农村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样是对农村生活的反映，有的热衷于粉饰现实，有的则致力于揭示矛盾；甚至于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也会出现不同的创作倾向。这种复杂的创作现象，反映出作家自身的矛盾、失误与时代的局限和扭曲。50年代末期，在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创作中，粉饰生活的作品使文学一度丧失真诚的品格，表现出伪现实主义的倾向。李準的《“O”的故事》、王汶石的《米燕霞》、周立波的《北京来客》、马烽的《太阳刚刚出山》、李德复的《典型报告》，都在当时社会风潮的裹挟下，程度不同地歌颂了浮夸风和共产风。60年代前期批判修正主义思潮的运动，又使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充斥短篇小说的创作领域。榴红的《雷打冲》、王汶石的《新任队长彦三》、王杏元的《铁笔御史》、彭伦乎的《烘房飘香》、高缨的《渔鹰归来》，都深深地带有这种“斗争文学”的烙印。由此，单一的阶级性更多地代替了丰富的人物个性，浓重的斗争色彩逐渐笼罩了多样的生活内涵，文学的模式化、类型化倾向日趋严重。

另一方面，一些创作态度严谨、艺术追求执着的作家，或以塑造农村新人形象为创作重心，力图摆脱为时尚所推崇的“运动文学”；或坚持写生活真实，并对浮夸风进行初步思索。这使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技艺娴熟、风格独特的短篇佳作。李準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赵树理的《“锻炼锻炼”》、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等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随着60年代初期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一部分作家开始正视农村现实矛盾，重新发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欧

阳山的《乡下奇人》、王汶石的《在沙滩上》、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西戎的《赖大嫂》、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作品，或崇尚求实，或针砭时弊，或隐或显地抨击了浮夸风。但这类作品后来却被认为格调不高昂，人物不完美，因而遭受种种非议。

工业题材短篇创作的新进展，在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延安人》等小说中表现突出。工人作家的成长，也给创作增添了新的活力。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费礼文的《早春》、唐克新的《沙桂英》、万国儒的《欢乐的离别》，都传达出新时代的工厂生活气息。但与其他题材创作相比，工业小说基本上处于“车间文学”的框架，整体创作质量还不高。

反映和平年代部队建设的短篇小说，可以透过林雨的《五十大关》、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齐平的《沉船礁》等作品，感受到时代精神和人物的性格美。

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使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开始发展。陈翔鹤的《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都曲折地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但这种新的创作尝试，很快为1962年以后的阶级斗争喧声所淹没。

建国后的17年，中篇小说创作比其他小说样式要逊色得多。这期间出版的700多部中篇，佼佼者甚少，平淡者居多，还不能以雄厚的实力而独立于文坛。总的来看，有两类题材创作比较丰富。一是战争题材，可以刘白羽的《火光在前》、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徐光耀的《小兵张嘎》、陆柱国的《风雪东线》为代表；二是农村题材，可以刘澍德的《桥》，孙犁的《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康濯的《水滴石穿》、管桦的《辛俊地》、柳青的《狠透铁》为代表。需要指出的是，有三部中篇佳作很值得重视。《桥》是最早涉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中篇，它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人物刻画而见长，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民

在命运选择中的痛苦嬗变和新生活的必然趋势。《铁木前传》则以真挚的感情和诗意的风格，揭示出建国初期新的阶级分化 and 人际关系变化的农村风貌。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对工业建设中某些重大问题的勇敢触及，以及它的雄浑笔调和悲壮风格，使它在17年的中篇创作中，具有明显的突破意义。

17年的长篇小说，成就显著，收获甚丰，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水平的集中反映。其主要成就，表现在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方面，它的创作踪迹有着鲜明的发展阶段性。

50年代前期，是长篇创作的初潮阶段。建国之初，长篇小说以它的第一批成果，引起了文坛的瞩目。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特别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赵树理的《三里湾》，集中显示了当时所能达到的创作高度。

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拉开以后，工业化的伟大前景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许多老作家满怀热情地深入到各条工业战线，在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笔耕拓荒。5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批工业题材小说，构成长篇创作过渡期中的重要文学现象。肖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罗丹的《风雨的黎明》，在热情反映新生活、努力开拓新的题材领域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由于作家在生活准备或艺术准备不足的情形下匆忙上阵，又无法摆脱当时文学观念的束缚，因而在反映生活和塑造人物上表现出一种急促和困窘，不仅创作的整体格局没有突破工业题材小说的模式，而且个体创作也未能超越他们从前的作品。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进入创作高潮，代表17年文学水平的作品多产生于这个时期。首先，这批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现实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感。从战争岁月中走过来的一代作家，以写胜利者战争史诗和自身历史的气度，创作出中国革命战争风云的历史长卷。

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作品，共同构成了这一题材领域的参天绿林。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作品，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变动和农民道路的抉择。此外，李劫人的《大波》、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则在新的题材领域，表现出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史沧桑变化和各阶层人民的进取沉浮。

其次，这批长篇小说以一系列堪称艺术典型的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象朱老忠、严志和、林道静、周炳、梁三老汉、盛佑亭等形象，不仅充满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具有深刻的历史容量和生活内涵，产生了较高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

再者，这批小说以多样化的艺术追求和趋于成熟的风格表现，产生了强烈的魅力。《红旗谱》的沉雄豪壮与民族格调，《林海雪原》的浪漫色彩和情节力量，《青春之歌》的清新质朴与抒情风味，《创业史》的真切细腻和史诗风度，即是有力的明证。

1962年以后，长篇小说出现落潮趋势，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创作高潮后的低谷，使这一阶段出版数量迅速下降，长篇力作明显缺乏。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虽然一时颇有影响，但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当时政治时尚的影响。长篇创作至此，逐渐进入低谷。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说

“文革”这场民族灾难，给文艺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畸形的发展，它造成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萧条时期。

“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政策和形而上学的创作理论，造成了

阴谋文艺、图解文学的大流行。短篇小说《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严峻的日子》典型地代表了阴谋文艺的创作。上海写作组集体创作的《虹南作战史》、南哨的《牛田洋》、胡尹强的《前夕》等长篇小说，则充斥着赤裸裸的政治说教和味如嚼蜡的干瘪语言，成为图解文学的直接翻版。即便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浩然小说诸如《金光大道》之类，也在流行观念和创作模式的束缚中，致使一个有生活功力的作家一度走上创作的歧途。

“文革”期间，一些作家在文化专制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于逆境中写出当时社会条件下难能可贵的作品。姚雪垠的《李自成》第2卷，张扬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的《第二次握手》，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以及李心田的中篇《闪闪的红星》、蒋子龙的短篇《机电局长的一天》，都显示了社会主义文艺在艰难境遇中的曲折发展。

三、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在历史新时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洪流，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带来了中国社会观念和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对生活有着敏锐感应、得风气之先的文学，在“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指引下，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文学自身的规律，也产生了全方位的跃动。

短篇小说的狂飙猛进，中篇小说的异军崛起，构成新时期文坛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创作实绩。从中短篇小说的发展道路来看，粉碎“四人帮”之初，刚从10年恶梦中惊醒、挣扎过来的文坛，更多地处于一种惯性运动状态。1977年底，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真正掀开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页。从此，文学创作开始在新的流向和新的层面得以发展。

1973年到1984年，反映现实人生的小说成为创作主流。关注和重塑国民灵魂的主题的渗透，对共和国道路的历史思考和现实

展望,使这一阶段的创作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反思意识和改革意识,不断产生与社会心理共振而引起的轰动效应。一场大的历史曲折和动荡之后,痛定思痛,往往会出现光辉的文学创造。对“文革”动乱的痛苦体验和觉醒意识,使伤痕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坛上的第一个创作浪潮。这种潮头文学,以沉重的呐喊和血泪的控诉,表现出强烈的反“左”意识和浓厚的感伤情绪。它突破了悲剧题材的禁区,重新恢复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成为历史转折期往往出现的“问题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首先开了伤痕文学的先河;宗璞的《弦上的梦》、肖平的《墓场与鲜花》、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都多方面揭示了人民在“文革”中的受难和抗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等,则是较早代表了这一创作思潮的中篇小说。伤痕文学偏重于对“文革”十年社会的政治批判性主题,其突破意义,更多地着重于社会政治角度,还无暇顾及创作自身的艺术变动。

接踵而来的反思文学创作浪潮,标志了伤痕文学的深化。它带着探索“文革”发生远源近因的性质,对共和国的历史道路进行了深刻反思,这就从伤痕文学对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向了对政治历史的审视,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民族的觉醒。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刘真的《黑旗》、李国文的《月食》、张弦的《记忆》、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方之的《内奸》等短篇小说,在较大的历史跨度中反思昨天,并赋予人物以饱经沧桑的历史感,这使上述作家得以达到他们创作中的一个高线度。

中篇小说于1979年开始崛起,起到了砥柱中流的作用。它对整个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并在反思文学潮流中,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布礼》、《蝴蝶》、白桦的《啊,古老的航道》、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贤亮的《绿化树》以及反映知青生活的梁晓声的《今夜有暴

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等作品，或把探索的触角伸向50年代后期的反“右”扩大化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把反思的目光一直延伸到民主革命时期，或大胆正视十年动乱的社会现象，把人民命运的变化与共和国道路的曲折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人们不能不正视民族道路的真实境遇。中篇小说的崛起，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密切相关，更为兼具短、长篇小说特点的中篇创作优势所致。同时，丛刊丛生，为中篇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阵地；中篇作家队伍的聚集，形成了一支独立而活跃于文坛的创作力量。上述种种，是构成中篇小说崛起的重要原因。

在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中，出于对十年动乱扼杀人性的悲剧的痛切认识，人性、人道主义的原则重新被确认，于是出现了人道主义的文学创作流向。问彬的《心祭》、宗璞的《我是谁》、铁凝的《哦，香雪》、方方的《大蓬车上》、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篇小说如刘心武的《如意》、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谭谈的《山道弯弯》等作品，多角度地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人的异化等生活课题，使文学向真实的人学近。

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始，逐渐形成了改革文学的创作潮流，它把文学对政治历史的回顾推进到现实的跟踪和思索上。早期的改革小说，或呼唤和歌颂富于开拓精神的改革者，或表现改革现实的矛盾和进程，诸如柯云路的《三千万》、邓刚的《阵痛》、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陆文夫的《围墙》等，中篇小说如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蒋子龙的《开拓者》、《燕赵悲歌》、周克芹的《果园的主人》、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都属于这个层面上的创作。之后的改革小说逐渐深化，更多地透过改革引起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来反映改革时代的真实风貌和艰难步履。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一弓的《流星寻找逝

去的轨迹》、陆文夫的《井》、矫健的《老人仓》、张炜的《秋天的思索》等作品开始流露这种新的深化倾向。还有一些并非正面描写改革的作品，却以它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刻发掘，获得了催促国人觉醒和沉思的变革意义，从而引起社会反响。如湛容的《人到中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路遥的《人生》等小说。

1984年以前的文坛，在反映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主潮之外，已经开始酝酿新的文学变革。王蒙的《春之声》等意识流小说，宗璞借鉴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蜗居》，李陀作为文学试验的《自由落体》，以及1984年以来出现的淡化情节、强化心理和情绪的小说，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何立伟的《白色鸟》、邓刚的《迷人的海》和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作品，则显示了一种创作的转机。上述小说无论采用什么手法，其创作追求是相似的，即从对客观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转向对主观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现，由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变化为自由舒展、形式多变的心理结构和情绪结构。

1985年的小说创作，以其重要的突破意义成为多元化的创作格局的转折。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社会审美趣味的变化，小说开始在社会现实小说、新潮小说、通俗小说三个层面上逐步分化，并日益呈现出清晰的创作流向。

1985年以后，反映现实人生的小说虽然不再以主潮的形态表现，但仍然以强烈的文学使命感和感时忧国的情怀关心着现实人生，并在开放的文化氛围中丰富着现实主义创作。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李锐的《厚土》、李国文的《危楼纪事》、田中禾的《五月》、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新兵连》、江灏的《纸床》等即是这类作品。近年出现的一些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的小说，诸如刘恒的《伏羲伏羲》、方方的《风景》、叶兆言的《悬挂的绿苹果》等作品，政治、道德倾向更加淡化，浪漫主义式的激情全部消隐，表现出社会的原生状态，形成一股有潜力